



“……父母对于子女,应该健全的产生,尽力的教育,完全的解放。”呼喊“救救孩子”的鲁迅,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如是写道。除了鲁迅,还有钱基博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胡适、丰子恺等一众学者、作家、画家,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,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,使得“父亲”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。



钱基博与钱钟书。



1936年,梁漱溟与两个儿子。



傅抱石与大女儿和二女儿。



胡适(右一)、江冬秀、长子胡祖望(左一)、次子胡思杜。

钱基博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

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,是学者、作家钱钟书的父亲。据说,钱钟书周岁时“抓周”,小手没有抓玩具,没有抓糖果,没有抓铜钱,而是抓起了一本书,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,“于车尘马足间,也总手执一卷”,因而喜出望外,取其名为“钟书”,意为钟情于书。

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,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,听说话,四处闲走,下午才授课,钟书玩得开心。1920年,伯父去世后,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,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。

慢开始潜心读书。

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,钱钟书十六岁时,还曾被痛打一顿。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,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,寒假没回无锡,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,没有温习课本,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。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,钱钟书过不了关,于是挨了打。此后,他才真正奋发读书,为日后治学打下了“童子功”。

1929年,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,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。一封信中说,“做一仁人君子,

比做一名士尤切要紧。”随后一封信则表示:“现在在外物论,谓汝文章胜我,学问过我,我固心喜;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,我尤心慰。”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,“我望汝为诸葛公、陶渊明;不喜汝为胡适之、徐志摩。”

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,埋首国学,他这样告诫钱钟书,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。“用我们今天的话,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”在《家世》一书中,学者余世存写道。

梁漱溟 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

1918年11月7日,自杀前三天,梁济问儿子梁漱溟:“这个世界会好吗?”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!”说罢,梁济离开了家。

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,但最终,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,他不停思考,积极奔走。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、梁培恕,对

于他们,给予最大自由空间。接受采访时,梁培恕说:“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,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。”这种教育,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,梁济对他就是“信任且放任”的。可以说,这也是一种“中国式传家”。

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,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。当时,梁培宽考了59分,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

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。“他只看了一眼,就又还给了我。”梁培宽说,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,“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”。

相比于课堂成绩,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。“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,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,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。”在《教育与人生》一书中,梁漱溟一再强调“生活本身的教育”。

傅抱石 注重和孩子的灵魂交流

国画大师傅抱石有六个孩子,两个儿子,四个女儿。世上的父亲大都是严师慈父,傅抱石却是个严父慈师。邻居一位小提琴家有很多孩子,每一个都从三五岁开始学拉提琴,大有棒槌底下出人才的架势。傅抱石说:“孩子的品性也许打得出来,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。”

傅抱石家中有聚谈之风,高朋满座,谈艺术、哲学、人生、事业,却从不涉及家长里短、人物是非——这让从小耳濡目染,身心皆修。

当孩子在言行举止上有不得体之处,傅抱石会批评,但在学习和

文化修养上,从不板起面孔说教。他买来《古典作品选读》,在目录上标注记号,打叉的绝对不要读,打圈的要熟读,打星的要背诵,这孩子懂得了“钻研”和“欣赏”的不同价值。

傅抱石宠爱女儿,自己一身旧长袍,旧布鞋,让女儿穿洋装和小皮鞋。

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瑶从小喜欢唱歌,一度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长大后当演员。1962年,傅益瑶随父亲去杭州,偶遇周恩来总理。周总理亲切地问她,“学不学画画?”傅抱石说道:“我这个

女儿呀,就是喜欢演戏,不喜欢画画。”

总理摸着益瑶的头说:“为什么不学画画呢?如果是别人的女儿,我就不说了。可是,你有个画家爸爸条件多好。你爸爸走的地方比我多,笔下出来的都是好东西。我要是你,就学画画了。”

那年,傅益瑶15岁。但是,回来后,傅抱石从来不向她提学画画的事。傅抱石对女儿说:“不论你将来做什么,都不能做文人,而要做文化人。文人是无行的,文化人是有德的。”

胡适 倡导“独立、合群、重学”

1908年9月,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,他发表了《论家庭教育》一文,在文中,强调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”。

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,女儿五岁时夭折,长子胡祖望,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,胡适忙于公务,无暇顾及。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,但仅读了几年私塾,又酷爱打牌,对于孩子的管教,少投入精力,多有责怪,不甚得法。

在家庭教育中,胡适倡导“独立、合群、重学”。1929年,胡适给胡

祖望写信,希望锻炼他过独立、合群、用功读书的生活,信的开头说:“你这么小小年纪,就离开家庭,你妈和我都很难过。但我们为你想,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。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;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;第三使你感觉自己用功的必要。”随后又说:“功课及格,那算什么?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,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。功课要考最优等,品行要列最优等,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,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。”这时,胡祖望十岁,离开父母,独自在外上学,父亲

如此高的期望,恐怕只会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

晚年,胡适对秘书说:“娶太太,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;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,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,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。母亲有耐心,孩子没有教不好的;孩子教不好,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。”

在给江冬秀的信中,胡适亦自我反省道:“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。平时不同他们亲热,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,习气不好。祖望你交给我,不要骂他,要同他做朋友。”

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,又不遇意外的事,子女便当然健康,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。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,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,却是停顿不得,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。凡动物较高等的,对于幼雏,除了养育保护以外,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。例如飞禽便教飞翔,鸷兽便教搏击。人类更高几等,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。这也是爱,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,这是对于将来。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,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,更健康,更聪明高尚,更幸福;就是超越了自己,超越了过去。超越便须改变,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,应该改变,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”,当然是曲说,是退婴的病根。假使古代的单

细胞动物,也遵着这教训,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殖,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。

幸而这一类教训,虽然害过许多人,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。没有读过“圣贤书”的人,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,时时流露,时时萌蘖;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,却未灭绝的原因。

所以觉醒的人,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,更加扩张,更加醇化;用无我的爱,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。开宗第一,便是理解。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,是以为成人的预备;中国人的误解,是以为缩小的成人。直到近来,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,才知道孩子的世界,与成人截然不同;倘不先行理解,一味蛮做,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。所以一切设施,都应该以孩子为

本位,日本近来,觉悟的也很不少;对于儿童的设施,研究儿童的事业,都非常兴盛了。第二,便是指导。时势既有改变,生活也必须进化;所以后起的人物,一定尤异于前,决不能用同一模型,无理嵌定。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,却不该是命令者。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;而且须用全副精神,专为他们自己,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,纯洁高尚的道德,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,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,不被淹没的力量。第三,便是解放。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,但既已分立,也便是人类中的人。因为即我,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,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;因为非我,所以也应同时解放,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,成一个独立的人。

这样,便是父母对于子女,应

该健全的产生,尽力的教育,完全的解放。

但有人会怕,仿佛父母从此以后,一无所有,无聊至极了。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,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;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,自然便会消灭。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,也应预备一种能力。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,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,有广博的趣味,高尚的娱乐。要幸福么?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。要“返老还童”,要“老复丁”么?子女便是“复丁”,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。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,得了人生的慰安。倘若思想本领,样样照旧,专以“勃谿(吵架—编者注)”为业,行辈自豪,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。

(原载1919年11月1日《新青年》)

有严父亦有慈师

钱基博、梁漱溟、傅抱石、胡适

【经典重读】

做父亲(节选)

我们现在怎样

鲁迅